

doi:10.3969/j.issn.1671-9247.2017.06.012

《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流浪汉故事的解读

江 群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乔治·奥威尔的自传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描述了作者在巴黎和伦敦的流浪生活,探讨了流浪汉现象的原因和危害,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力;采用幽默的创作手法,以喜写悲,对贫穷、饥饿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具有震撼人心的真实力量。

关键词:《巴黎伦敦落魄记》;乔治·奥威尔;传记文学;政治批判;以喜写悲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47(2017)06-0035-04

Comment on the Stories of Tramps in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JIANG Qu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nhui, China)

Abstract: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is an autobiography of George Orwell, describing the author's vagabond life in Paris and London, which probes into the reason and harm of vagabond phenomenon, and full of powerful political criticism. Orwell used humor to create the humorous images of the tramps, with the techniques of writing grief with joy and humor, and gav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poverty and hunger. It has the power of authenticity in biography literature.

Key words: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George Orwell; biography literature; political criticism; writing grief with joy

1933年发表的《巴黎伦敦落魄记》是乔治·奥威尔(1903—1950)第一部公开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他在巴黎和伦敦的流亡生活。整部作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描写作者在巴黎的流亡生活,作者租住在巴黎贫民窟的三雀旅馆,这里的房客大多是流亡在巴黎的外国人。旅馆肮脏不堪,臭虫遍布,房客稀奇古怪。作者少许存款被偷,丢掉了家教的工作,当掉衣物,穷困潦倒,忍饥挨饿,最终找到了一份洗碗工的工作,每天在闷热肮脏的地下室工作十几个小时。作品第二部分主要描述作者无法忍受洗碗工的生活后,从巴黎回到伦敦,然而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沦为无业流浪者,结交了几位流浪汉朋友,在各个收容所颠沛流离的种种经历。

1922~1927年间,奥威尔在英帝国的缅甸殖民地当警察,他对自己这段经历非常内疚,“我意识到巨大的罪恶感,我得赎罪。我觉得这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如果你做五年你完全不赞成的工作,你可能会感同身受。我想深入到被压迫者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站在他们一边反抗暴君”^{[1]xi}。在此背景下,《巴黎伦敦落魄记》记录了奥威尔放弃缅甸的帝国警察工作之后,在巴黎和伦敦的流浪生活,描述了贫穷、饥饿和过度劳累对流浪汉群体身心的吞噬,讽刺和揭示了法律、权利阶层以及宗教团体对于流浪汉表面救助,实际鄙视、控制和践踏的事实。小说以喜写悲,让读者哭中带笑。

一、幽默的流浪汉形象

这部作品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流浪汉莫非幽默的鲍里斯。鲍里斯是作者在巴黎时的好友,曾任俄

国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团上尉,十月革命爆发后流亡法国,做过酒店侍者,后因腿瘸而失业。鲍里斯灵活、聪明、乐观、见识颇广,一顿饱饭就能让他重振信心、乐观无比。他和作者穷困潦倒时患难与共的友谊让人颇为感动。

出门找工作之前,鲍里斯会把自己打扮一番,他用报纸堵住鞋子上的眼,用墨水把从袜子洞露出来的脚踝部分涂黑,并且拍打脸颊,让饥饿苍白的脸上现出点血色。这不禁让人想起周星驰喜剧电影中主人公用画笔画出领带,冒充富家少爷追求女孩的场景。鲍里斯非常聪明,绝境之下总能想出妙招绝地逢生。一个犹太人欠了鲍里斯三百法郎,还钱方式是收留鲍里斯睡在他租住的旅馆房间的地板上,另外每天给鲍里斯两法郎。犹太人欠了一个星期的房租后,准备从旅馆逃跑,顺便把鲍里斯甩掉。旅馆老板夫妇时刻盯防未付清房租的房客携行李逃走。鲍里斯想出妙招,先于犹太人跑掉。他放弃衣箱,让作者用他的大衣遮着鲍里斯的大衣,拿去当铺当掉,然后去河边捡些石头带回旅馆,放进箱子里。因为欠费房客一离开,房东就会到房间拎他的箱子,如果仍然很重就不会怀疑。但由于当铺要求衣服一定要用箱子装起来,这个计划就失败了。鲍里斯想出另一条妙计,他利用房东喜欢谈论体育的特点,下楼到账房和房东聊自行车比赛,吸引他的注意力,咳嗽一声为号,让作者携箱子和衣服等溜走,然后他去街角和作者会合,最终计谋成功,他们溜之大吉。

作者少许存款被偷,家教的工作也丢掉了,当掉衣物,节衣缩食后,手里只剩六十法郎。他去找鲍里斯,希望鲍里斯能帮忙介绍一份厨房里的的工作。作者找到

收稿日期:2017-07-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WW050);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8A0239,SK2015A285)

作者简介:江 群(1980—),女,安徽六安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鲍里斯之后发现他的情况更加糟糕,于是没有提及介绍工作的事,并且赶紧下楼买了块面包给鲍里斯。从此,作者每天贡献三四个法郎,鲍里斯贡献两个法郎,他俩在作者的旅馆房间里用酒精灯煮土豆汤和面包糊口,同时四处找工作。后来,他们的钱花光后,作者又是一天没吃东西,躺在床上,鲍里斯给他送来了一块面包,并且告诉作者他找到了一份在酒店餐间的工作。之后连续三天鲍里斯从酒店偷来食物,包在报纸里送给作者,还推荐作者在这家酒店找了份洗碗工的工作。作者和鲍里斯可谓是流浪巴黎的一对异国难兄难弟,虽然鲍里斯从酒店为作者偷食物以及逃离旅馆等情节有失风雅,但他俩患难与共的友谊颇为珍贵。

二、流浪汉在穷困绝境下的离奇经历

鲍里斯和作者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有过一段滑稽的离奇经历。鲍里斯从一个俄国流亡者那里听说有条路子,可以弄到钱。当时,巴黎有家莫斯科报纸的记者站,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间谍,他们需要招人写一些关于英国政治的文章,报酬丰厚。作者对政治一窍不通,鲍里斯建议作者抄袭保守派报纸《每日邮报》的文章,然后和它反着写。鲍里斯的一个朋友带他俩偷偷摸摸地来到了这个秘密的记者站,在一家干洗店的楼上,是一个寒酸的办公室,墙上钉着俄文宣传海报和列宁画像。他们见到两个俄国人,其中一个人一见面就指责他俩太不小心了,没有带一包干洗的衣服来掩人耳目。两个俄国人和鲍里斯用俄语就革命问题进行了谈论,然后要求鲍里斯和作者交二十法郎的入会费。他俩没有这么多现金,鲍里斯最后付了五法郎。俄国人又对作者盘问了一番,交代作者撰写关于英国政治的系列文章,并承诺每篇一百五十法郎稿费,通过第二天的第一班或第二班邮差通知作者,分别前其中一个俄国人再次嘱咐他俩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包干洗的东西。下楼后,鲍里斯欣喜若狂,花了五十生丁买根雪茄庆祝。结果,连续三天,作者都没有收到那个秘密团体的信。十天,他俩又去了那个秘密的记者站,秘密团体不见了。显然,这个所谓的秘密团体是个诈骗团伙,骗取入会费,他们和共产党也许毫无瓜葛。

流浪汉查理属于典型的恶棍流浪汉。他出身高贵,受过教育,后选择离家出走,靠家里偶尔寄来的钱过日子,落魄到要和作者住在同一家贫民窟旅馆。他肤色粉红,一头小孩子般的褐色软头发,嘴唇像樱桃一样红润,在孩童般的面庞下却藏着一颗邪恶的心。查理父母让他哥哥找他回家,他设法将哥哥灌醉,偷走了哥哥身上的一千一百法郎,用这笔钱逛窑子,强暴了一个被父母卖身为妓女的农村姑娘。家里不再给他寄钱,查理当掉了一切,身无分文,三天没有吃东西,仍然不愿意工作,却想出了一个歪主意。当时查理和一个名叫伊冯娜的姑娘同居,他教唆伊冯娜假扮孕妇去公立产科医院,那里向孕妇提供免费饭菜,伊冯娜每次吃饱之后,把面包和乳酪塞在口袋里带回来给查理吃。一年后,查理和伊冯娜在路上碰到了产科医院的护士,护士询问宝宝是否是男孩,伊冯娜浑身发抖,紧张地说不是。护士又问那显然是个女孩了?伊冯娜太紧张了,也回答不是。查理立刻说是双胞胎,护士非常高兴。查理为自己的机智感到骄傲,在小酒馆里向大家炫耀这段经历,吹嘘他的智慧救了他和伊冯娜。奥威尔表述“我描述他(查理)只是为了展示在金鸡街能发现活跃着多么多样性的人物”^{[1]xi}。金鸡街是作家在巴黎居住的贫民窟街道。奥威尔在作品最后表示恶棍流浪汉

属于极少数。

三、流浪汉现象的原因和危害,对资本主义权利阶层的批判

奥威尔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宣称,他“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2]。“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3]442}奥威尔反对极权主义的作品主要创作在1936年以后,以《动物世界》和《一九八四》为代表。其第一部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是通过描写贫困流亡者的痛苦挣扎,全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具有犀利的政治批判力,是奥威尔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先声和重要体现。

作品对失业流亡原因及其危害的探讨反映了奥威尔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失业问题的批判,以及对社会底层大众的关注,充满社会主义人道精神。大部分的流亡者都是因为失业导致贫困流亡。文中以幽默的手法记述了作者的一次应聘经历。一个马戏团招人,工作主要是让一头狮子从胯下穿过,十分危险。作者提前一小时到,已有五十个人在排队,作者调侃狮子具有某种吸引力。小说深入探讨了流亡生活的三大危害:饥饿摧毁了流亡者的身体和未来的工作潜能;流浪汉绝大多数是男性,流浪使他们和女性绝缘,催生了收容所里的同性恋行为;流浪汉不断流动,每天步行几十英里,从一个城市的收容所颠簸到另一座城市的收容所,因为英国《游民法》规定,“流浪汉一个月内不能进同一间收容所或者伦敦的任何两间收容所超过一次,违者拘留一周”^{[4]120}。这三大危害摧垮了流浪汉的身心,使他们成为无用的社会弃儿。

作品批判了《游民法》《寄宿宿舍法》和《乞丐法》这三项法令,提出保护流浪者权益的修改意见,体现了奥威尔民主社会主义法治观。《游民法》如前所述,充分暴露了当权阶级恐惧群氓闹事,以此项法律将流浪汉捆绑在路上。关于《游民法》,奥威尔认为流浪汉不断流动完全是由其造成的,每间收容所的目标就是把流浪汉赶到另一间,因此后厨浪费严重,大量美食被倒掉,对流浪汉提供劣质茶点。奥威尔建议收容所可以经营一个小农场,至少一块自用菜园,要求身强体健的流浪汉干活,这样既可以改善流浪汉伙食,又可以让流浪汉做出贡献,允许他们在一家收容所呆更长时间,避免现在的人为流动。除了收容所,流浪汉的另一选择就是寄宿宿舍,但《寄宿宿舍法》只是“致力于禁止酗酒、赌博、斗殴等,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寄宿宿舍的床铺必须睡着舒服”^{[4]175}。关于《寄宿宿舍法》,奥威尔认为应该增加维护流浪汉权益的规定,比如要求寄宿宿舍老板提供足够的卧具和更好的床垫,把宿舍隔成小间等。《乞丐法》规定,如果你走到陌生人面前跟他要两便士,他可以报警,让你因为乞讨而被关七天,这就导致大量身无分文的流浪者采取一些“合法化的犯罪行为”,如骗人照相,来赚取钱财。

作品抨击了金钱至上的社会氛围以及特权阶级,倡导平等民主的价值观。“金钱已经变成对美德的极其重要的试金石”,流浪汉中很多人被迫乞讨遭人鄙视,作者嘲讽“要是一个人靠乞讨每周能挣到哪怕十英镑,乞讨马上就会成为一种高尚职业”^{[4]144}。巴黎的酒店存在等级制度,最低等级的洗碗工因为比他等级高的侍者不允许留胡子而必须刮掉胡子。酒店不同等级

的工作由不同种族的人承担，法国人承担高等级的办公室雇员或厨师等工作，侍者是意大利和德国人，洗碗工各个国籍都有。

作品抨击宗教捆绑和强行传教的行为，体现了奥威尔宗教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奥威尔在这本书中传达了强烈的反宗教情绪，在他看来教堂向流浪汉发放免费茶水和面包，并以此强行传教是宗教特权阶层对底层流浪汉的羞辱和精神捆绑，流浪汉对此非常反感和抵制。书中描写了一间福音派教堂，每周一次给流浪汉施舍茶点，茶点用完，礼拜开始了。流浪汉们开始捣乱起来，整个楼座上，流浪汉们懒洋洋地靠在座椅上，又是大笑，又是说话说个没完，又是探出身子往楼下的会众那里弹面包团。牧师忍无可忍，大声宣布要把这次布道的最后五分钟，讲给那些尚未获救的罪人听。作者评论这一幕和流浪汉平时的举止——如他们接受施舍时通常会表示感激——大相径庭，跟卑躬屈膝时也大不相同。“他们给我们东西吃让我们受辱，我们以此来报复。”^{[4]152}与此相比，当一个羞怯的牧师向流浪汉发放餐券，他除了道一声晚安，别的什么也没说，流浪汉们向他表露了真正的感激之情。

马路画家博佐深受作者的喜爱和推崇。博佐腿脚畸形，走路困难，以在马路上绘画为生，收入微薄，常常露宿河堤路和收容所，但他不愿为了面包去教堂，并且热爱观察星空和星座。当三位牧师来到贫民窟的旅馆厨房做礼拜，厨房里上百号人表现默契，视他们为不存在，照常说话、吃饭、打牌。作者评论“他们拿这种想法安慰自己，即他们多么勇敢，‘置之度外地冒险深入最深的巢穴’”^{[4]150-151}。对此事，博佐认为“一旦你的收入低于某个水平，人们可真的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有权利对你传道布教，为你祈祷”^{[4]151}。由此可见，奥威尔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自由的权利，宗教特权阶层向流浪汉强行布道是对这种自由的剥夺，他们有权利抵制反抗。

四、作品的艺术特征

（一）以喜写悲，幽默的创作手法

弗洛伊德在《论幽默》一文中写到“幽默的本质就是一个人免去自己由于某种处境会得到自然引起的感受，而用一个玩笑使得这样的感情不可能表现出来”^{[5]323}。他认为“幽默不是屈从的，它是反叛的。它不仅表示了自我的胜利，而且表示了快乐原则的胜利，快乐原则在这里能够表明自己反对现实环境的残酷性”^{[5]323}，它能够将自我从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烦恼中摆脱出来，是一种超我的状态。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巴黎伦敦落魄记》主题虽然是黑暗的，但奥威尔以喜写悲，让读者哭中带笑。幽默的创作手法弱化了黑暗主题的沉重和压抑，增强了读者阅读过程的愉悦感，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多方位立体地刻画出流浪汉群体的形象，颠覆人们对于流浪汉邋遢、懒惰的刻板印象，强化读者对这一社会底层群体的同情和怜悯，同时体现了奥威尔对严酷生活的反叛和超脱，以及审视过往痛苦人生历程的超然态度。幽默的人物形象容易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接受，鲍里斯的乐观和聪明，作者的真实和善良，博佐的清高和坚持均通过作品幽默生动的语言和跌宕起伏的情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共鸣。

（二）真实的力量，传记文学的价值

在1935年出版的法文版本《巴黎伦敦落魄记》的介绍中，奥威尔写到“我认为我可以没有任何的夸大，

只是做了一些取舍，所有作家都会这么做的。我觉得我没有必要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进行描述，但是我描述的每一件事情都确实发生过”^{[1]xiv}。《巴黎伦敦落魄记》的感染力和批判力源于作品是传记文学的性质，也源于奥威尔真实的生活经历。作品对于饥饿的描写细致入微。当作者和鲍里斯只剩下六十生丁时，他们用这些钱买了半磅面包和一些大蒜，因为用大蒜擦面包吃，大蒜的气味在嘴里可以留很久，让人感觉像是最近吃过东西；作品对于底层体力工人过度劳累的描写充满感染力。作者在巴黎一家名为让·科尔的私人餐馆做洗碗工，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他和厨师要提供一百餐饭菜，过度疲劳让他俩异常烦躁，争吵不止，相互咒骂。作者有时没有搭上末班地铁，只能在餐馆打地铺，不过没关系，因为在那时，他就算在鹅卵石路上也能睡着；作品对流浪汉善良品性和落魄生活的描写感动人心。收容所开门之后，格拉斯哥流浪汉斯考蒂追上作者，把四个湿漉漉的、变了形的、看着就恶心的烟头塞进作者手里，因为作者昨天在收容所里请斯考蒂抽烟，所以当收容所开门，斯考蒂就给作者烟，当然，流浪汉买不起烟，只能在马路上捡烟头抽。奥威尔发表于1949年的政治预言小说《一九八四》描写了极权统治下恐怖的舆论控制，不仅现实生活中人的言行、思想被严密监控，而且历史都可以按照老大哥的意愿被篡改。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正是在真理部记录司从事修改往期报刊文章、篡改历史的工作^[6]。相比而言，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就是把底层流浪汉群体的生活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读者，这既体现了奥威尔的创作原则，也反映了他正直、真实的人生信条。

（三）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矛盾

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一文中写到“过去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感觉到党派偏见和不公。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有某种谎言我想揭穿，有些事实我想唤起人们的注意，我最初关心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但如果同时没有一种美学感受，我就不会写一本书，甚或一篇为杂志而写的长文。”^{[3]443}这段话充分表现出奥威尔作为作家对于作品艺术价值和政治价值的共同追求。作者不想被贴上“政治作家”的标签，但是“这并非易事，它引出了结构及语言的难题，而且以新方式引出了真实性的难题”^{[3]443}。奥威尔认为写作有四个动机，包括纯粹的个人主义、美学热情、历史冲动以及政治目的。在文章的结尾，奥威尔总结如下：“我不能十分肯定地说出我的几种动机里哪种最强，但我知道哪种值得遵循。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3]444}由此可见，在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政治价值之间，奥威尔在做到两者兼顾的同时，更重视后者。这一点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正如前文所言，奥威尔本可以在缅甸享受殖民地警察的优越生活，但作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他自愿放弃，决心“深入到被压迫者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站在他们一边反抗暴君”。巴黎伦敦的落魄生活既是形势所迫，又是奥威尔自主的选择。法律、权利阶层以及宗教团体对流浪汉群体的压制和践踏体现了社会权利阶层的冷漠和自私。

（下转第48页）

分隔布局不再固定单一。

要最大化保留公租房中小户型的使用面积,以钢铁结构的搭建方式来看,因需要一定空间来进行外框架的搭建,虽然在占地面积上有所减少,但整体的空间占用率较高,并且节点之间焊接的固定方式,使结构体之间无法进行灵活的拆装变化。在现有搭建方式的基础上,将榫卯进行结合设计是很好的选择。首先将钢框架去除,替换为榫卯节点的载体。其次通过铁钉或其它固定方式,将其固定在空间的顶部与墙面,其余块面通过榫卯的方式进行连接,使其可以根据不同租赁者对空间需求的不同进行安装与拆卸。最后保留板材表面的材料选用,使其“墙面”在空间面积的占用上达到最低。选材则采用较轻的板材,在确保“墙面”坚固的同时,减轻其重量,保证榫卯结构的稳定性。在保证整体结构安全性的同时,“墙面”重量的减轻也有利于日后再次拆卸与安装,如图3至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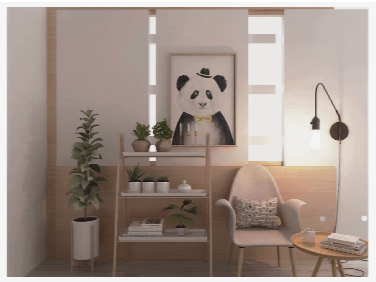


图3

榫卯结构的组合,去除了钢铁框架搭建的繁琐与固定性,可以轻易将“墙面”整体拆卸下来,再将榫卯载体进行拆卸,根据个人需求重新固定位置,将“墙面”通

过榫卯嫁接固定,从而得到空间的个性划分,满足不同租赁者的生活需求与心理需求。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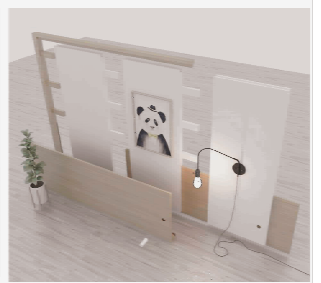


图5

四、结语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只要与居住者心理以及生理需求相符合的住房又有何陋之有呢?而公共租赁住房的建筑室内空间也同样如此^[4]。只有让不同公租房受众人群的心理以及生理需求得到满足才可为租赁者提供一个更为舒适的家居空间。公租房家居空间的规划设计应不断完善与发展,满足越来越多的住户需求。

参考文献:

- [1]公共租赁住房 and 廉租住房并轨有关问题解答[J]. 新法新规, 2014(3):37.
- [2]袁辰鸿. 室内空间形态的模块化设计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 [3]李红伟. 拆:消失的文明[D]. 大连:大连工业大学,2013.
- [4]周琴. 公共租赁住房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研究[D]. 武汉:湖北工业大学,2013.

(责任编辑 聂根兰)

(上接第37页)作品探讨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即对于群氓的恐惧。权力阶层认为“群氓是这样一种低等动物,让他们闲下来会带来危险,让他们忙得没时间思考才更安全”^{[4]98}。

作品最后几节深入探讨了流浪汉现象的原因和人们对于流浪汉的误解,批判了有关流浪汉权益的法律并提出修改意见,总结了伦敦的俚语和脏话。奥威尔表示“《动物农场》是第一本我写时对自己所做的有完全清醒的认识,混合了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的书”^{[3]444}。如果说《动物农场》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更像是一部传记式社会调查报告。

五、结语

英国短篇小说家、评论家 V. S 普里切特曾称赞奥威尔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7],这个评价十分中肯,“冷峻”体现在奥威尔作品强大的批判力,“良知”体现在奥威尔关注底层,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感。《巴黎伦敦落魄记》创造了形形色色的流浪汉形象,探讨了贫穷、饥饿和过度劳累对流浪汉群体身心的吞噬,批判了

法律、权力阶层和宗教团体对底层流浪汉的压制和践踏,充满了强大的政治批判力。

参考文献:

- [1]Orwell George.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1.
- [2]Orwell George. *The Road to Wigan Pier*[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1:89.
- [3]杰弗里·迈耶斯. 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M]. 孙仲旭,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 [4]乔治·奥威尔. 巴黎伦敦落魄记[M]. 孙仲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5]弗洛伊德. 论幽默[C]//朱立元,李钧.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6]乔治·奥威尔. 1984[M]. 董乐山,高源,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7]Orwell George. *Such, Such Were the Joy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53: The back cover.

(责任编辑 聂根兰)